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朱越利
◎ 主编

理论·视角·方法

——
海外道教教学研究

齊魯書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朱越利
◎ 主编

理论·视角·方法

——
海外道教教学研究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视角·方法:海外道教学研究/朱越利主编.
—济南:齐鲁书社,2013.6

ISBN 978-7-5333-2742-2

I. ①理… II. ①朱…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3640 号

理论·视角·方法——海外道教学研究

朱越利 主编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23.5

插 页 3

字 数 611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742-2

定 价 98.00 元

本书由下列宫观资助出版

茅山乾元观(江苏省金坛市)

骊山明圣宫(陕西省西安市)

玄天岭玄帝观(吉林省吉林市)

凤凰岭桃源观(北京市)

泉州元妙观(福建省)

北京吕祖宫(北京市)

咸阳中五台道观(陕西省)

前言：海外道教学研究任重道远

朱越利

日文“道教学”有两种用法：多数日本学者将英文“Taoist Studies”翻译成“道教研究”、“道教学研究”或“道教学”等，这里所说的“道教学”是指学者对道教进行的学术研究并形成了学科；少数日本学者使用日文“道教学”统指道教的教义、戒律和科仪等构成的体系。^① 中文“道教学”也是指学者对道教进行的学术研究并形成了学科，与多数日本学者使用的日文“道教学”的涵义相同。

外国学者对道教进行学术研究，早已形成学科。比如，日本于1950年成立了“日本道教学会”，韩国于1982年成立了“韩国道教学会”。日本早稻田大学福井文雅教授说从1974年开始道教学在日本才作为独立的学问逐渐获得承认。^②

将包括中国道教学在内的世界各国道教学统括起来总称，可

① 如〔日〕吉冈义丰教授于1950年在《中元お盆と敦煌本中元玉京玄都大献经》一文中指出六朝和尚法琳也精通道教学，于1961年在《敦煌本太平经について》一文中高度赞扬梁道士陶弘景是道教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学者，于1965年在《三洞奉道科诫仪范の成立について》一文中强调《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对于道教学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石井昌子教授于1980年出版了《道教学の研究——陶弘景を中心に》一书，继承了其师吉冈义丰教授对道教学概念的用法。

② 〔日〕福井文雅：《道教思想の研究と問題点》，见〔日〕秋月观暎《道教研究のすすめ》，平河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称为“国际道教学”。比如,1968年9月在意大利的佩鲁贾举行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oist Studies”,日译就是“国际道教学会议”,也可以照这样译成中文。这次会议被迫认为第一次国际道教学会议。根据“国际道教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国际道教学会议欢迎中国道教学者与会。但在佩鲁贾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道教学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举行的第二次国际道教学会议,中国学者都没有出席。不是中国道教学者不想与会,而是由于中国正值“十年浩劫”,众多的中国学者正在饱经磨难,斯文扫地,被剥夺了从事学术活动的权利。1979年9月第三次国际道教学会议在瑞士苏黎世举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明教授和天津大学陈国符教授应邀出席,外国学者终于高兴地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中国同行姗姗来迟的身影。

“世界道教学”的内涵与“国际道教学”相似。由于“国际道教学”或“世界道教学”包括中国道教学在内,所以用“国际道教学”或“世界道教学”一语统称中国道教学之外的所有外国的道教学,结果是名大于实。笔者曾使用“世界道教学”一语统称中国道教学之外的所有外国的道教学,应当纠正。^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耀庭研究员统称中国道教学之外的所有外国的道教学为“海外学界对道教的研究”^②,也有学者统称中国道教学之外的所有外国的道教学为“国外道教研究”^③,均名实相当。

《荀子·正名》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① 朱越利、陈敏:《道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辟有《世界道教学史》一节和《世界道教学成果》一章。

② 陈耀庭:《道教在海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③ 覃光广、冯利:《道教与瑶族:来自国外的研究信息——〈瑶族神象研究〉简介》,载《宗教学研究》1986年第2期,第78页。

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对所有外国的道教学的总称,至今还没有约定俗成。21 世纪初我们组织翻译外国学者的道教学著作,将丛书定名为《海外道教学译丛》^①,本书使用“海外道教学”一语统称中国道教学之外的所有外国的道教学,以待善名。

与海外道教学相对应的是中国道教学。海外道教学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视角、方法,提供了可作为比较的参照系,可以帮助我们的研究避免封闭和僵化,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外国文化。我们要经常借鉴、参照海外道教学,还要对之进行认真的研究。中国学者对海外道教学进行研究,是中国道教学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学者对海外道教学的研究”,本书称之为“海外道教学研究”,以待善名。

海外道教学由海外各国的道教学组成。海外各国道教学开展得很不平衡,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形成道教学。本书《理论·视角·方法——海外道教学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5BZJ011 的最终成果,主要对法国、日本、德国、英国、荷兰、加拿大、俄罗斯、韩国、美国等九国的道教学进行研究。除了澳大利亚之外,道教学比较发达的国家本书基本上都谈到了。本书的作者以中国学者为主,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外国学者撰文,助我们一臂之力。

本书《理论·视角·方法——海外道教学研究》由 9 篇论文、7 篇述评和一组附录《海外道教学文献目录(1945~2008)》组成。本前言仅对本书各部分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解读,并展开来就“海外道教学研究”这一学科略抒己见。

^① 2009 年,为了变单向翻译(海外道教学著作译为中文)为双向翻译(海外道教学著作译为中文和中国道教学著作译为外文),改名为《道教学译丛》。

一、海外道教学史和海外道教学“发明”

海外道教学的耕耘者是外国道教学者。外国道教学者开展海外道教学,他们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划分为三方面:一、研究中国道教和中国道教学;二、研究本国道教和本国道教学;三、研究除中国之外的他国道教和他国道教学。需要注明的是,第二、三方面所说的“本国道教”和“他国道教”,因具体国家不同而内涵广狭有异。具体地说,有的国家的“道教”既包括宫观和道士教团,又包括本国文化中吸收、消化的中国道教的某些成分。有的国家的“道教”仅指本国文化中吸收、消化的中国道教的某些成分,因为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出现过宫观和道士教团。

(一)海外道教学历史悠久

近现代海外道教学是海外汉学(Sinology)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随着海外汉学的开展而形成与发展的。

自公元8、9世纪始,欧洲相继经历了“旅游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

13~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随着外国人对中国了解的逐步增加,在欧洲率先出现了汉学(Sinology)。法国汉学家、敦煌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说:“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法国的先驱则是它的南方邻国: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①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院士说的“先驱”主要就是这些传教士,其中也包括法国的耶稣会士。这些人被称为“实践型汉学家”。由16~18世纪

① [法]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法国汉学研究史》,见[法]戴仁(Jean-Pierre Drège)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Cinquante ans d'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实践型汉学家”传到欧洲的中国文化,对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浪潮。这些为汉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传教士汉学”为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在学术上真正称得上汉学(Sinology)的是第三个时期的“专业汉学”。

1. 法国

法国道教学的历史在欧洲是最早的,是在法国汉学(Sinologie)的进程中从研究中国道教起步的。

早在17世纪,得益于法国海上贸易的发展,一些憧憬、向往东方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义,他们不断从中国寄回了大量中国书籍,就是这份资源使得法国在19世纪时得以在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占据了领导地位。由法国耶稣会士们传到法国的中国文化,在法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大量资料。18世纪西欧弥漫着“中国风”或“中国趣味”,启蒙思想家从中搜寻理论根据,从而使正处于“旧文化废,新文化兴”时期的法国初步奠定了汉学基础,确立了法国作为欧洲汉学中心的地位。那时法国启蒙思想家推崇的是儒家学说。^①

16~18世纪时,欧洲对道教基本上一无所知,是通过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给欧洲带去了有关中国道教的信息。传教士无意中发现了中国的道教,将之称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处于草创期的18世纪的法国汉学存在着“重儒轻佛”的弊病。所谓“轻佛”,泛指不重视研究儒家之外的中国其他思想和各种宗教。

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决定开设世界上第一个汉学讲座(Chaire de Sinologie),即“汉、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座,首任讲

^①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43页。

席是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又译为“莱慕萨”)教授。开设这一讲座, 标志着法国汉学(Sinologie)的确立。从此, 法国汉学家们开始克服“重儒轻佛”的弊病, 开始注意研究中国的道家、佛教、道教, 也涉及中国的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等。

华东师范大学许光华教授认为:“19 世纪法国的道教研究也是由雷慕沙开始的, 他于 1823 年发表了《论老子的生平及其作品》, 用法语试译了老子的《道德经》的第 1、25、41、42 各章, 并提出了他的看法。”^①

到 20 世纪初, 法国汉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著作呈现多样化。法兰西学院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教授是这一时期的汉学大师之一。仅翻译司马迁《史记》一项成就, 沙畹教授即足以名垂千古。沙畹教授不仅被视为法国汉学研究的开拓者, 也被视为道教学术研究的开山祖师。多数学者认为, 法国的道教研究开始于沙畹。这一看法与许光华教授不同。1910 年, 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教授发表《泰山——有关一种中国崇拜的专题论文》, 后附《中国的社神》。^② 如果从 1910 年算起, 至今 2010 年, 海外道教学已经走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路程了。1919 年, 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教授又发表了《投龙简》一文。^③

几乎与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教授同时, 法国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神甫于 1911 年出版了两卷本《道教》, 第一卷为

①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 学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34 页。

② *Le T'ai 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 Paris: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28, pp. 415 - 424. 1910. (《吉美博物馆年鉴》第 28 卷, 第 415 ~ 424 页。巴黎, 1910 年。)

③ *Le jet des dragons,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vol. 3, Paris, 1919, pp. 53 - 220. (《东亚论丛》第 3 卷, 第 53 ~ 220 页。巴黎, 1919 年。)

《总目录》，包括《道藏》和官修引得和私修引得两部分，还有《号数推算表》和《道藏分类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做学生时编《道藏子目引得》就参考过这部著作。^① 戴遂良(Léon Wiegier)神甫 1913 年出版了《道教》第二卷《道教的天师》(*Les Pères du système Taoisme*)，包括《老子》、《列子》和《庄子》三部分。戴遂良(Léon Wiegier)神甫 1917 年出版了《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 depuis l’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1976 年英译本名为《道教：中国的哲学》。

在沙畹(Edouard Chavannes)教授 1918 年去世后，他的三个弟子法国远东学院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法兰西学院马伯乐(Henri Maspero)教授和巴黎东方语言专门学校“远东史地”讲座教授葛兰言(Marcel Granet)成为汉学研究的杰出学者。许光华教授说：“法国对道教真正引起重视的是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两位汉学家。”^②

18 世纪末，法国成立了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等一批汉学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法兰西学院一直扮演着法国汉学的领军角色，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一直是法国汉语教学的重镇。19 世纪，法国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汉学家，并且逐渐形成一支职业队伍，并且成立了汉学学会，创办了汉学刊物。^③ 这些，使法国长期居于欧洲汉学的中心地位。法国汉学家视野开阔，许多人在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儒家、佛教等的同时，也研究道教。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出现了一批主要研究道教的道教学者，法国自然而然地也成为欧洲的

① 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哈佛燕京学社 1935 年版。

②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4 页。

③ 参阅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7～99 页。

道教研究中心。

法国作为欧洲的道教研究中心,实施了一项国际学术合作项目。1979年欧洲汉学协会秘书长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又译为“施博尔”)教授提出一项《道藏》科研项目,成立了巴黎、罗马、威尔茨堡和苏黎世4个研究小组。除了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学者外,还有英国、美国、丹麦的学者参加,得到荷兰、日本、中国学者的支持。这一项目的最终成果是《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2004年出版。^①

本书有法国远东学院华澜(Alain Arrault)研究员的《法国道教研究的丰硕成果——法国道教研究简史》一文(程乐松译),对法国道教学作了最新的介绍和评论。

2. 德国

德国一些汉学家把自15世纪到19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以及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的探索统统称之为“前汉学”(Protosinologie)。^②从19世纪后半叶起,德国开始从前汉学向汉学转换。如果以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汉学正教授职位算起,德国的汉学的形成比法国迟了近百年。如果以莱比锡大学1878年设立东亚语言专业副教授职位算起,德国的汉学的形成比法国迟了60多年。二战以后汉学在德国成为独立的学科。20世纪70年代以后,汉学成为一门显学,并且换了一个

① [法]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和[法]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合编*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道藏通考》),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关于德国汉学史的分期,学界尚无统一意见,参阅李雪涛《德国汉学史的分期问题及文献举隅》(《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第112~120页)。

名字——中国学。^①

虽然德国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汉学才不过 100 年的历史,但是德国的道教研究于“前汉学”(Protosinologie)时期就开始了。一说开始于 19 世纪前半叶。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又译为“莱慕萨”)担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首任讲席时有一位德国学生尤利乌斯·海因里希·克拉普洛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克拉普洛特于 1816 年成为柏林大学教授,于 1828 年出版了《太上感应篇》的法译本(*Chrestomathie mandchou ou recueil de textes mandchou*),1833 年,他用法文撰写了《论中国的道士宗教》。^② 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耀庭研究员说:“也许可以说,克拉普鲁斯是德国汉学家中研究道教的第一人。”^③“克拉普鲁斯”即“克拉普洛特”的另一种音译。

本书有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撰《微观研究、前沿性和思辨性——德国道教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一文,认为德国的道教研究开始于 17 世纪后半叶。张思齐教授说:人们过去对德国道教学的认识,误区不少,误区之一是认为德国对道教的研究开始得晚。德国汉学的形成虽然比法国晚,但德国的道教的研究却没有那样晚。有一大批人是通过研究有关印度的学问而绕道走上研究中国道教的道路的。1682 年,德国医生安德烈·克雷耶(Andreas Cleyer)曾把中国的《崔真人脉诀》一书翻译成拉丁文呈现给欧洲读者,是目前所知德国道教学的最初起源。

他又说:战后 20 年,德国的汉学已从政治和战争造成的痛苦

① 王维江:《20 世纪德国的汉学研究》,《史林》2004 年第 5 期,第 7~13 页。

②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De la religion tao-szu en Chine', 载 *Nouvelles annales de voyages* (《新旅行纪事》), 1833 年第 2 期。

③ 陈耀庭:《道教在海外》,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1 页。

中恢复过来,道教研究在德国汉学中也逐渐流行起来,并取得许多成果,后继有人。

3. 英国

北京语言大学熊文华教授将英国汉学史划分为前汉学时期(17~18世纪)、传教时期(19世纪初至19世纪70年代)、后传教时期(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和当代(20世纪下半叶至现在)。1840年,伦敦大学创办为期五年的汉学讲座,基德牧师(The Reverend Samuel Kidd)被聘任为首任汉学教授,标志着英国汉学新阶段的到来。^①

随着英国汉学新阶段的到来,英国道教研究开始得也比较早。1859年,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牧师出版了《中国的宗教状况》(*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一书,称道教是朴素的唯物论,讲述了道教关于上帝的观念和道教的神秘主义。1879年,英国伦敦大学道格斯(Robert Kenanway Douglas)教授出版了《儒教与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1880年,英国牛津大学理雅各(James Legge)教授出版了《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②20世纪英国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主编的对道教评价极高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蜚声中外。

本书的张思齐教授撰《科学道和生活道——英国道教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一文说:“成立时期的英国道教学,在时间的跨度

① 参阅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② 胡优静:《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65、75页。

上涵盖 20 世纪的前半段……其主要成绩是基本的道经其英语文本大体齐备,并且开始对世界各国产生影响。”“当代及当前的英国道教学,在时间上涵盖二战以来直至当前时期,其主要成就是专业化的研究,以及对于世界各国的辐射和影响。在这一阶段,除了传统的文本译注在数量上有很多增加、在道经的门类上有更多的拓展之外,‘科学道’和‘生活道’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以及当前英国道教研究的两大亮点。”

4. 荷兰

1851 年,荷兰莱顿大学设立了中文专业。1875 年,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1890 年,荷兰汉学家、莱顿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薛力赫(Gustave Schlegel,又译为“施古德”)与法国汉学家亨利·科尔迪埃(Henri Cordier,又译为“亨利·高第”)共同创办了西方第一个汉学学报——《通报》(*T'ong bao*)。薛力赫与亨利·科尔迪埃之后,有时是法国学者主编《通报》,有时是荷兰与法国两国学者共同主编。《通报》(*T'ong bao*)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影响。

薛力赫(Gustave Schlegel,又译为“施古德”)教授 1903 年去世后,荷兰历代著名汉学家有莱顿大学的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与许理和(Eric Zürcher)等教授。^①

前面介绍过的法国学者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又译为“施博尔”)教授也被列为荷兰汉学家。他 1934 年出生在瑞典,祖籍荷兰,曾任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① 参阅〔荷〕戴闻达(J. J. L. Duyvendak)讲演,马军译注《荷兰对汉学研究的贡献》,载《史林》2007 年第 S1 期,第 5~15 页。〔荷〕伊维德(W. L. Idema)著,马清槐、唐芜译《荷兰汉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上、下)》,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 年第 1 期,第 79~86 页;第 2 期,第 89~91 页。

他长期在法国工作,曾任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他曾在中国台湾学道,居住8年。2005年11月,施舟人教授获得了中国的永久居留权,创立了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并创办了“西观藏书楼”。笔者荣幸地成为造访“西观藏书楼”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记得有一年我与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任吕敏(Marianne Bujard)教授谈到介绍海外道教学者的问题,她极认真地问我:“欧洲的一些学者长期在他国从事研究工作,或者在两个或更多个国家工作过,他们应当归入哪国介绍?”我一时语塞。施舟人教授就属于这种情况。

荷兰的道教研究是从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教授开始的。他1881年出版了《中国厦门人的年节和风俗》(荷兰文)、1892~1910年出版了《中国的宗教系统及其古代形式、变迁、历史及现状》(*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1912年出版了《中国的宗教:天道观——研究道教和儒教的关键》(*Religion in China: Universism, A Key to the Study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等。^①

本书的四川大学张崇富教授的《发明阙疑 痕印台闽——荷兰道教研究的成就与特色》一文说:“荷兰的道教与其殖民扩张、海上贸易的发展紧密相连。正是这些历史的原因,导致荷兰道教研究跟福建和台湾的关联十分密切。毫不夸张地说,荷兰的莱顿大学乃是荷兰道教研究的摇篮,随着荷兰中国历史的讲座教授的设立、汉学院的成立和《通报》的兴办,荷兰汉学和道教研究的学术地位逐步得以确立,并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

5. 美国

美国汉学起步比欧洲晚,但起点较高。美国“汉学之父”卫三

① 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426页。

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曾长期在中国工作。他1876年回国,1877年任耶鲁大学教授。他于1848年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标志着美国汉学的开端,“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模板”。他1874年编的《汉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但总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汉学规模仍远远落后于欧洲。与此相同,美国的道教研究也不如欧洲。日本早稻田大学福井文雅教授总结说:“总之,历史短浅。”^①

福井文雅教授举出的美国战前有关道教的代表性成果是公理会牧师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又译为“阿瑟·史密斯”)1899年出版的《中国的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与法兰西学院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又译为“莱慕萨”)教授于1823年发表《论老子的生平及其作品》比,《中国的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晚了70多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汉学注重实用,方法创新,演变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迅猛发展,很快跃居国际汉学研究的前列。有学者说:“西方的汉学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②在此形势下,美国道教研究也变得突飞猛进。福井文雅教授评述二战后的美国道教说:“道教研究在稳步发展,这也是事实。”^③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2009年说:

① [日]福井文雅:《欧美的道教研究》,见[日]福井康顺等监修,朱越利、冯佐哲等译,毛良鸿校《道教》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

②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③ [日]福井文雅:《欧美的道教研究》,见[日]福井康顺等监修,朱越利、冯佐哲等译,毛良鸿校《道教》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页。